

广府文化研究基地丛书●

主编：林有能 江佐中

广府文化与改革开放研究

——广府文化与改革开放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香港出版社

• 广府文化研究基地丛书 •

主编：林有能 江佐中

广府文化与改革开放研究

——广府文化与改革开放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香港出版社

翻
印
必
究



版
權
所
有

广府文化与改革开放

——广府文化与改革开放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主编：林有能 江佐中

出版发行：香港出版社

Hong Kong Publishing

Flat 6, 9/F, Kenbo Commercial Building

335-339 Queen's Road West

网址：Http: //www.hkbooks.com.hk

电话：21161998

传真：21161988

开本：850x1168 1 / 16

印张：23

字数：380千字

印数：1-1000册

版次：2010年5月第一版

国际书号：ISBN 978—988—17190—9—6

定价：30.00元

CONTENTS

目录

广府文化的定位与走向	陈泽泓 / 1
从广府文化研究谈到岭南文化中心 ——广府文化研究之一	罗晃潮 / 13
有关广府文化的两个问题	赵立人 / 22
广府文化的特点及其影响	王克群 / 28
浅议广府文化、改革开放与和谐广东	刘傅峰 / 34
从历史大视野看广府文化的科学精神	冼剑民 / 42
论广府文化资源的产业化培育	陈建刚 / 50
把握改革开放新机遇 为广府文化增添新活力	何子健 / 57
粤语的文化价值	罗康宁 / 64
粤港澳文化创新及其扩散与区域效应刍议	司徒尚纪 许桂灵 / 75
粤港澳合作建设广府文化圈的难题与路径探索	吴建华 / 88
人世近俗的人生态度 以俗为雅的文化趣味 ——论广府文化对改革开放以来广东戏剧影视的影响	杨凡周 / 94
广府漫画文化与社会变革	江沛扬 / 103
论广府建筑文化的基本精神	唐孝祥 赵楷 / 115
广府传统建筑的再现 ——以广州大学城博物馆建筑群为例	唐丽 / 121
早茶民俗的嬗变与广府文化的传承	王思维 / 128
南雄珠玑移民在珠三角、香港的后裔分布数量探研	宋会群 / 137
香山文化与广府文化简论	胡波 / 148
岭南文化三大派系——广府文化、客家文化、潮汕文化的形成 ——兼论广府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杨海耀 张宏 / 155

广府商业广告的主要历程及其社会影响	江沛丰 /	164
“始发”何必争 “主港”雄千秋		
——也谈粤穗之“海上丝路”地位贡献	汪叔子 /	172
在国家精神中追寻南国风格	徐肖楠 /	183
试论张锦芳、黄丹书、黎简“张吾军”思想	张 琼 /	189
打造广府功夫文化品牌,为创建和谐社会服务	梁旭辉 /	197
从古代广东政区治所的设置看广州的岭南文化中心地位	罗晃潮 /	206
浅谈改革开放以来广州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利用	程存洁 傅京芳 /	212
广州工业遗产保护方略初探	杨宏烈 /	222
古代湿地环境对广州文化景观形成的影响	曾 新 /	231
从广府文化谈到佛山文化软实力的开发	叶春生 /	236
佛山文化在广府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	袁钟仁 /	244
论佛山在岭南文化中的地位	陈恩维 /	252
论广府文化与佛山文化的时空性	王元林 /	261
佛山文化在广府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	张永锡 /	267
佛山人精神在广府文化中的体现	刘 东 /	278
佛山文化与香山文化同样灿烂		
——佛山文化在广府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	杨晓敏 李土华 /	287
当代“粤商精神”的演进是佛山提升民营企业竞争力的内驱力	张子龙 /	295
广府文化与课程改革		
——乡土课程建设浅论	陈 斌 /	303
从岗雕乐的嬗变看广府文化的兴替	任鏊文 /	313
文化传统与制度变迁		
——基于佛山改革开放 30 年历史的经验研究	何一鸣 /	323
明清佛山庙会及其功能的研究	李小艳 /	332
顺德改革开放与广府文化的发展	沈 涌 /	342
互动与共进		
——近代和改革开放历程中顺德与广府文化的发展	李健明 /	349
顺德改革发展进程中对广府文化的传承与超越	陈建华 凌远清 /	354
后记	林有能 /	363

广府文化的定位与走向

陈泽泓

一、何谓广府文化

岭南文化中包含有汉族三大民系文化：广府文化、潮汕文化、客家文化。在上世纪已经分别建立对潮汕文化和客家文化专门的研究机构，开展了较为系统的学术研究，成果斐然，有“潮学”、“客家学”之说。而广府文化的研究却只在分散的、表象的层面上，这与广府文化在岭南文化中的主体地位是很不相称的。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研究对象之不确定则是重要的原因。因此，对广府文化界定一个比较严谨的、明确的概念，圈定一定的研究范围，是系统研究必须面对的一个基础性、前提性的课题。

界定广府文化，必须从语言、地域、意识形态、生产方式、物质生活等方面予以考虑。

先说语言因素。广府文化是广府民系的文化。所谓广府民系，通常有一种说法指的是使用粤语方言地区的汉族族群。按照这一说法，广府人的分布地域相当广大。有学者认为：“广府人是华南汉族的主要族群之一。广府人分布在粤中、粤西南、粤北，以及桂东南一带，人口约有 5100 万，其中广东约有 3800 万，广西约有 1300 万。”^①（笔者按：此统计数字应是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的数字）。李权时主编的《岭南文化》一书圈出的广府民系地区，大体也是这个范围：“大致包括广东东南部珠

^① 徐杰舜主编：《雪球——汉民族的人类学分析》第 167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

江三角洲一带（含今香港、澳门），整个粤中和粤西、粤西南部、湛江地区和广西南部地区。”^①也有学者提出“广府风俗文化群落”这一命题，并指出其可再分为珠江三角洲、西江流域、粤西谷台地和粤北山地丘陵风俗文化群落。^②但是，在这么大的范围中生活着的居民，是否有可能同属于一个对某些社会文化要素认同的社会实体，或者说是具有相同文化特征的一个族群呢？《岭南文化》列出广府文化特征主要的六个方面是：农业的多层次耕作技术以及经济的多元化，这是广府文化所有内涵的基础；广府地区是岭南商业贸易最活跃的地区；物质生活实用性是广府文化异常突出的特征；开放性和兼容性；强烈变革的意识和心理；平民性和市民意识。显然，这些特征并非在上述所谓广府民系地区都表现得很突出。例如，广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地区称得上岭南商业贸易最活跃的地区，而粤西、桂南就谈不上最活跃地区了。笔者不赞同笼统地将在岭南使用粤方言的居民划分为一个民系，因为他们除了使用同一方言之外，在意识形态、生产方式、物质生活等方面并不显示出有“自觉为我”或者相当接近“自觉为我”的文化特征。《岭南文化》一书所列举的广府文化之“带有鲜明地方特色的文化门类和现象”是粤曲、粤剧、佛山及广州工艺、广州建筑艺术、广州菜及带有奇异风情的广府民俗，这些文化现象无论如何只能作为以广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文化特征，而不能代表上述划定的范围要大得多的粤语覆盖地区的文化特征了。

再说地域。广府文化的界定与广府的概念有密切的关系。“广府”是一个历史地名，与历史上的行政区划名称有关。“府”在岭南之设置，最早追溯到南北朝时期的梁、陈两朝均设有广州都督府。南朝的都督府设于各军事要冲之地，管辖若干州县的军政、民政，但不算是一级行政区划，并没有在全国普遍设置。隋代在州、郡之上设有军政合一的总管府，唐代沿之，不久改为都督府，以都督充任节度使。广州都督除了充任岭南道节度使，还兼统领桂州、容州、邕州、安南四府经略使。宋代广州上属广南东路，下辖南海、番禺、增城、清远、东莞、香山、怀集、信安、新会9县。元代设广州路，辖番禺、南海、东莞、增城、香山、新会、清远、广州录事司。

① 李权时主编：《岭南文化》第64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② 司徒尚纪：《广东文化地理》第247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明代开始设广州府，这一行政区划的划定有划时代的意义。明以前，广州作为州或郡一级的行政区划，其辖境历朝变化盈缩不一，但范围都是比较的，隋代的广州（南海郡）境域就包括粤中、粤北以及粤西的部分地区。明代广州府由元代之广州路、桂阳州、连州合成，辖番禺、南海、顺德、东莞、新安（今宝安）、三水、增城、龙门、清远、香山、新会、新宁（今台山）、从化 13 县以及连州及连州所领阳山、连山二县。顺德、新安、三水、新宁、从化都是明代新设立的县。广州府较宋代的广州略有收缩（析出怀集）。连州所辖属二县在元代为桂阳州、连州各自仅有的属县，较广州府其他直辖县与广州府的关系要疏远一些，到了清代，仍设广州府，但连州及属县又从广州府分出。清代广州府的辖县，加上新设的花县共 14 县，这一区域的地理范围，实际上是以元之广州路为基本范围，只是由于人口、经济的发展，在这一地域范围内在明代新辟了 4 县、清代新辟 1 县，因此，广州府的基本境域从元代开始一直稳定了 700 多年。这一境域中的居民，长期处于同一中级行政区划之中，对其民风民俗的融合是有很大的影响的，有共同特征的地域性民系文化臻于成熟正是在这一时期。由于元代不设府，存在时间又短暂，因此，将“广府”理解为源自明代始设的广州府，所谓广府民系指的大体是这一地区的使用粤方言的汉族居民（杂居在这一地区的汉族居民还有客家人、疍家人，少数民族有回族和满族）。

再看其他方面的因素。岭南文化是一个由多元文化成分组合而成的地域文化，其组成成分包括以不同语言为特征的多元民系文化。“民系”一词，即使像《辞海》这样全面而又权威的词汇工具书也未收入，但在 20 世纪许多研究者的学术著作中已广泛使用。20 世纪末，有学者提出“要与国际学术界接轨，使用共同的话语，必须放弃不规范的‘民系’、‘支系’说，而采用国际人类学界惯用的‘族群’说。”“族群是一个对某些社会文化要素的认同，而自觉为我的一种社会实体。这个概念有三层含义，一是对某些社会文化要素的认同；二是要对他‘自觉为我’；三是一个社会实体。”^① 美国人类学家郝瑞（Stvan Harrel）1996 年 9 月 16 日在厦门大学作学术报告时指出：“要具体解释族性，应先区分民族（nation）与族群（ethnic

^① 徐杰舜主编：《雪球——汉民族的人类学分析》第 17、12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

group)。英文 nation 是指有 Stata 或 government 机构的一个族群，含有国家和民族两层意识。而族群本身并不一定含有 Stata 或 governmet 的意义，它只是有意识、有认同的群体的一种。”^①显然，使用“族群”的概念要比“民系”有更为明确的严谨的科学范畴，但为顺应约定俗成的用法，本文仍沿用“民系”一词，而在这一词汇的内涵定义上，则采用上述关于“族群”的诠释。

广府文化特征呈现由中心向周边渐变的状态。区域文化的中心是珠江三角洲，处于三角洲边缘北部的清远、龙门，西部的台山、新会等县份，其民俗文化分别受粤北、粤西民风民俗的影响而呈现出与珠三角有所区别的逐渐过渡状态。在西部边缘形成了四邑（新会、台山、开平、恩平）文化（后加上鹤山，又称为五邑文化）。清远、龙门等地则呈现出与珠江三角洲北部接壤的粤北山地丘陵民俗文化影响的特征。位于珠江口的香港、澳门沦于英、葡殖民统治之后（按照澳门史学者的说法，澳门不能称为殖民地），其社会形态、生活习俗有了较大的变化，但因为当地居民主要使用粤语及其与珠江三角洲各邑有着地缘、血缘、亲缘的密切关系，其民俗文化形态可以视为广府民俗文化在中西文化强烈碰撞、渗透、融合情况下的一种边缘过渡状态。这样，在广府文化珠江三角洲核心区的西、北、南面，就分别出现了五邑、粤北、港澳等三个过渡型的广府文化亚文化区。那么，核心区东面的民俗文化是怎样的一种形态呢？珠江三角洲东邻的东江流域惠州地区流行的是惠州话，在判断惠州话归属何种语系上，着实让语言学家们颇费心思，他们称之为“粤、客难分的惠州话”，“是一种归属未定的方言。”^②这种语言现象，反映了地处广府地区与客属地区之间的惠州地区粤客文化交流频繁的背景。这种交流活动的载体是东江。实际上在东江下游流域的东莞、宝安、香港地区都有这种广府、客家民系频繁交流的情况，只不过这些地区更为靠近广府文化核心地区，广府文化的成分逐渐占了主流。惠州地区离广府文化中心地带较远，而且在行政区域上，从隋代开始就与广州并立，受广府文化的影响明显减弱，因此在这一地区出现了粤客文化界限模糊、融化的情况。至于雷州半岛徐（闻）海（康）地区的地域文化则自称为雷州文化，说不上与

^① 《中国人类学会通讯》第 196 期，转引自徐舜杰主编：《雪球——汉民族的人类学分析》第 13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

^② 李新魁：《广东的方言》第 530 页，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广府文化有什么归属联系了。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如下结论：语言既是形成民系文化的基本条件，又是民系文化的重要特征。作为汉语七大方言之一的粤方言，在广东的覆盖面甚广，语言面貌差别也比较大，这种语言上的差异，反映了同是流行粤方言的各地，在文化特征上也有较大的差异。在粤中以及粤北和粤西南的部分地区，按照语言学家的划分就有广府片、高（州）廉（江）片、罗（定）广（宁）片和四邑片之分，^①广府民系文化中心区大体与广府片相符，其余各片只能算是广府文化亚文化区，广府民系的文化特征，实际上是处于一种由核心区向周边渐变的状况，珠江三角洲是最具代表性的广府民系文化核心地区，离核心区越远，其民系文化特征就越呈现出一种过渡变化越大的状态。因此，我们在研究和表述广府文化时，当然是聚焦在以广佛地区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总而言之，广府文化是以使用粤方言为语言特征，分布在以珠江三角洲为中心以及珠江三角洲周边的粤西、北部分地区的民系文化。

二、能说广府文化是岭南文化的代表吗

广府文化不等于岭南的整体文化，也不能代表其他分支文化，更代表不了其他分支文化的发展方向。广府文化自身，也存在其核心区与亚文化区、广府文化与其他文化区交错、交融的问题。

以往在珠江三角洲讲广州白话的人很大程度上自以为代表了广东，所以，今天一说广府文化，就很容易把它与岭南文化混为一谈。

一提到岭南文化的表现，许多人马上想到的就是喝早茶、看粤剧、讲粤语，这些表现，属于广府文化的表现，当然也算是岭南文化的一种文化现象，但却不是岭南地域的普遍现象，更不等于全部的岭南文化。在岭南这一地域上，今时的分支文化，不仅有广府、潮汕、客家三大民系文化，有港澳文化、特区文化、少数民族文化，而且还有三大民系文化并不能全部包容代表的汉族的雷州文化、桂东文化、琼州文化等，甚至在讲粤语的江门地区也有着不甘俯就为广府文化一部分的五邑文化。就拿三大民系来说，潮汕人、客家人讲的不是粤语、欣赏的不是粤剧，而喝早茶的

^① 李新魁：《广东的方言》第26、27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做法也是改革开放以后才在潮汕与客家地区推广，但也未能像广府地区那样蔚成习俗。总之，广府文化只是岭南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不能等同于岭南文化。

说广府文化是岭南文化的代表，是说广府文化的特征在岭南文化的诸分支文化中最为引人注目，地位最为突出。这种地位，与广州地区在历史上长期作为岭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历史地位有关，与珠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发展的领先地位有关，与广府地区在与中原文化、外来文化的交流中得风气之先的区域优势地位有关。不妨对比一下，客家文化其实不限于岭南，在江西、福建，一样很成气候；潮汕文化与闽南文化有着亲缘的关系及不少类似的表现。只有广府文化是“纯岭南”的。岭南文化的总体特征，如背靠南岭面向大海而在长期中养成的向北相对封闭向南极为开放的特征，在广府文化中确实表现最为突出。在接受海外文化融为自己的特色的开放性上，广府文化有较强的能量。粤语中融入外来词的现象就比坚持“宁卖祖宗田，不忘祖宗言”祖训的客家话要突出。在饮食上同样有名的粤菜与潮菜相比，粤菜的善变与潮菜的求精表现出不同的长处和特色。潮汕人在工夫茶上表现出那种全神贯注的茶道，与广府人在茶市中表现出来的那种商业性全方位的发挥，属于两种截然不同的境界。与内地相比，地处岭南最大的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的广府地区，在江海交织的水网中形成的水文化特征相当突出。由于通向外海以及长时间一口通商的影响，这种水文化是开拓型而不是保守型的。从整个岭南地区来说，各地在总体特征上所表现出来的岭南文化基本特征的强弱并不一样，客家民系的水文化特征与广府民系的表现就更为弱化。广府文化由于特定的政治中心、地理区位与特殊的历史过程而形成的适时善变，注重实际的文化特征，使之在岭南文化的诸分支文化中占有强势地位、中心地位。因此，外来的人一提到岭南文化，首先想到的就是广府文化的表现，是理所当然的。

但是，广府文化不等于岭南的整体文化，也不能代表其他分支文化，更不代表不了其他分支文化的发展方向。粤语可以扩张向其他地区，但不能代表或代替潮汕话、客家话及少数民族语言。粤剧、潮剧、汉剧是各具特色的地方戏剧。潮菜、东江菜与粤菜是不同菜系，就连工艺美术，也要分潮绣与广绣、潮瓷与广瓷、潮州木雕与广式木雕。因此，我们在研究广府文化时，对于其在岭南文化中的地位要给予恰如其分的估评，既肯定其地位的突出，也不要过分夸大其地位，更不要一以概之，将其等同于岭南文化。当然，文化的分区不是一刀切，文化现象更不是一成不变的，

同处于岭南地域的广府文化及其他诸文化之间的联系及区别，处于一种动态的变化之中。比如，香港和深圳原先是客家文化占主流的地区，其后逐渐演化为广府文化、客家文化杂存的地区，现时则广府文化的表现明显比客家文化突出。香港有着百年殖民地历史，深圳是新时代崛起的特区，两地的文化特征不同，与广府文化也不同，但因为地缘、血缘等关系，两地的文化中都反映出广府文化深深的影响，在香港还更多表现出旧时广府民俗文化的烙印，又有老上海和西方文化的种种痕迹。

三、我们今天该怎么看广府文化

广府文化自身充满生机活力的优势，也有其先天之不足。

广府文化的主要特征是开放、务实、善变。三者是互相联系的，开放是民系的环境特征，务实是民系的本质特征，善变是民系的表现特征。

广府民系的开放，不仅有其自然环境条件，还因为其历史环境条件。作为自然条件，便利的江海交汇、面向大海的水路交通，以及远离政治中心的地理位置，使广州持有长期的合法的全国对外贸易中心的优越地位，与开放的经济交流俱来的是广泛的文化交流。作为历史条件，岭南文化起步迟于中原，岭南是大一统封建国家中远离全国政治中心的基层。因此，无论从文化上还是政治上，处于一种从属的地位。在过去的历史长河中，有过短暂时间的封建割据的南越、南汉王朝，但这些王朝的政治模式、文化原动力其实都来自中原。因此，岭南文化的发展从一开始就是不自觉地接受着外来先进文化的滋润和影响，而且感受到这种滋润和影响给岭南进步带来的推动力。作为岭南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的广府地区，从这种开放与接收中带来的进步更为明显。在广府历史重大发展的每一时期，几乎都可以看到这种吸取外来文化的动力。最早入粤的任嚣、赵佗带入的秦文化，使岭南首郡南海郡治番禺县（其范围大概相等于后来之广府）首先得到封建文明的开发，进入了本土文化与中原文化融合的历程。六朝时期，广州以开放的姿态容纳了来自江南的易学大师虞翻和道教启蒙大师葛洪，也接待了来自西域后来被奉为中国禅宗祖师的达摩。吸收着各种文明的精萃，丰富了岭南文化的内涵。隋唐宋元时期，以宋璟、李勉、程师孟、蒋之奇为代表的入粤官员致力于发展地方经济建设。即使在岭南文化已经发育丰满的清代，阮元、张之洞、林则徐等人物对粤地的政治、军事、文化、教育、

洋务、实业的发展，仍然发挥了引领前进的作用。近代的西学东渐，使广府人睁开双眼看世界，冲破封建思想樊笼，吸收西方科技文化，赋予了广府文化充满生机活力的别开生面的地方文化特色。正因为如此，广府人对于外来文化的进入从容相待，有一种较为自觉的拿来主义的适应性。外来宗教的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和天主教，都是以广州作为桥头堡，这些宗教在广州登陆及存在有不同的历史背景原因，活动方式也不同，但显然为广府人开辟了新的文化交流渠道，推动了广府社会文化的多元化。康有为寻求救国新径，是在殖民统治下的香港和上海租界受到了重要启发。孙中山的民主思想，与他在檀香山、香港所受的教育有很大的关系。毗邻澳门的香山唐家湾出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任的民国总理、清华学堂的第一位校长、由买办转化而成的近代大工商业家。从得风气之先到领风气之先，已经形成了一种潜质，渗透入广府文化的各个领域。这种开放，受岭南发展的需要以及中外文化的发展水平所影响，在各个时期有不同的重点。新中国成立后数十年间，广交会是唯一的外贸窗口，实际上，也是沟通外部世界的桥梁。新时期的商品经济理论、中国城市的市场价格改革与实施对外开放政策，都是在广府地区取得突破性的进展的。

务实，是广府民系生存条件所造成的。广府人没有那种位居政治中心的可以居高临下发表高深理论的优越地位，也不可能有多余闲暇去从事高深理论的研究，这里必须经常应对来自四而八方的文化交锋，这里更是一处商者云集的商战之地，身在其地的佼佼者主要精力只能聚焦于经济利益，无暇顾及一举一动及各种事物的正名，即使被视为明代划时代的思想家的陈白沙、与王阳明理论可以抗衡的湛若水，他们的著述并不多，他们倡导的是以心领会。被列为大儒的朱次琦临终之前干脆将自己生平著述付之一炬。贯串着广府学术文化的一条主线是经世致用，于是在广府学术文化高峰期出了陈澧、邹伯奇这样的学识丰富、精通百科的学者。广府的意识形态中，渗透着远儒重商之意识，着眼于经济利益的追求。早在明万历首辅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赋税改革之前，嘉靖时任浙江巡按的南海人庞尚鹏就已经在浙江全省推行一条鞭法的改革尝试，此后他还在福建、两广任上继续推行此法，在管理盐务、屯田上还多所建树。

广府人的务实作风，表现在说实话、干实事，求实效、讲实惠上。这种风气，在改革开放之初，藉以打破根深蒂固的思想禁锢就显得十分有力和必要的了。有人

说广府人会生仔不会起名，是不善于高级思维的表现。其实，这种行动方式与邓小平关于不管白猫黑猫，能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不争论姓“社”姓“资”的理论，是不谋而合的，这也正是广府地区能够成为改革开放的试验地并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基本原因。尽管近年来正名、取名甚至名在实先、以名饰实的浮躁风气也悄悄地沾染了广府地区，使广府地区的务实之风受到侵蚀消磨，但是广府民间务实之风则依然存在，成为广府地区经济发展的有利条件。务实在生活习俗上表现得甚为突出，衣吃住行中，广府人把吃排在首位，穿排在末位。穿只求舒适随意，而吃却颇有讲究。广州人不但敢吃、而且会吃，上桌的菜式，要一件一件上，一件一件吃，最好是吃得净光，倘有剩余，还要打包带走，家产百万者也不例外。所谓吃好不浪费。而不像北方盛行的讲究叠盘迭碗，以示好客，吃不完才显得够气派。广府人在事业上有一种拼命精神，日常生活则偏爱舒适，穿着拖鞋、睡衣上市，一度司空见惯。赏花品茶，本是何等斯文悠雅之事，而到了广府，一样的赏花品茶，却能酿成轰轰烈烈的花市、食客如云的茶市，一样不失其人情味，又带来无限商机。以趋利为核心的务实精神，表现为平民意识和享乐文化的形态。注重享受，讲求实际，使广府人虽然很会做生意，却似乎不像宁波人、潮州人那样不断产生超级大富豪。也正因为务实，就不在乎符合什么规则理论，而在乎实际目的。改革开放之初，不受陈规制肘，又需认真对待，广东人提出了“见到红灯绕道走”和用尽政策的策略，这个道理内地人未必不懂，但只有在广府才做得到。还应该说，这与那种“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阳奉阴违或把政策变了样执行的做法是两码事，绕道走的目的是为了向前走，用尽政策是为了使政策发挥其最佳效应而不是用来束缚自己。

善变，是开放与务实的必然结果和表现，有一个从被动到自觉的过程。因为是开放的，在不断接纳融会各种外来文化的同时，必然使自身发生变化，从而处于一种不断变化的态势。以致有人在评点全国一些大城市的文化面貌时，将广州说成一个说不清的城市。但是这种变化的基本立足点是务实，换言之，是以利益为最终的驱动力的，这就制约着其变化的方向。对于一些事物，追求变化未必不是好事，比如饮食，粤菜是善于吸纳和变化的，其变化的原则，就是要得到市场的认可，在创新中获利，而使食客有了口福，让粤菜得到丰富发展。另一方面，有的文化在创新时还需要有深度，这就不是只凭变化就能解决问题的。比如粤剧，观众队伍的流失是剧种生存的致命威胁，行内人注重变化的一个着眼点就是看重票房，较为注重表

演手段的新奇。追求新奇不择手段，百无禁忌，不怕四不像。电影问世时，粤剧把电影搬上舞台背景，又将粤剧率先拍成电影。粤剧可以将东方的西方的以至流行歌曲的调子入戏。因此，粤剧的面目变化在各剧种中可谓最快，其乎民性、娱乐性的骨子里是商业性。在民国时期这种做法曾经为粤剧取得一时的轰动效应，至于这种变化的努力在现代社会条件下是否能够为其注入新的生机活力，下结论还需要待以时日。而过多地追求噱头的负面效应，必然会削弱表演艺术的高雅性。

善变给予广府文化与时俱进的能力，也给予广府文化作为一种民俗文化的生命力。善变的动力在于开放与务实，广府文化的活力，是在将外来的东西化为己有而又不留痕迹。有人将广州方言与上海话作一比较，这两种方言都有相同的外部条件，却呈现出不同的发展态势。沪语收缩粤语长红，粤语表现出超稳定超范围流行，“搞掂”、“搵食”、“T恤”、“炒更”、“买单”、“无厘头”、“擦鞋”、“人气”、“案底”、“夹心阶层”、“人间蒸发”等等新词，不少是从外来语言中直接音译过来的，但却带有浓郁的粤味，迅速走向全国。固守阵地的上海话，即使在上海重新成为全国经济中心之今时，却仍然是一种圈子里的语言。（很多上海话的词汇、表述也走向全国；粤语对普通话的影响也不宜夸大，上面列举的词汇很多在北方也不流行。建议不一定这样比较）在建筑方面，广府人将传统的干阑式建筑与西方的建筑风格结合起来，产生了蔚为特色景观的骑楼，不光是标新立异的外观，更主要的是骑楼的实用功能，符合商业性、平民性的规则。正是这种商业性的特征，使广府文化在中国社会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中，更显示出在文化、经济领域中独有的引领时尚潮流的突出态势。这些态势其实有不少是外来文化时尚、经济模式的传播。然而也因此是得一时之先，却不在乎其“知识产权”之争了。有心者看到的是这么一种现象，“高第街革命了，喇叭裤在那条狭窄街道一喇叭，通过一个个红白相间的编织袋（广州人俗称偷鸡袋）拖的拖拽的拽，以迅猛之势，全国喇叭了；毛宁张口一首‘蓝蓝的月亮’，东南西北也月亮蓝蓝了，于是乎，涛声依旧和弯弯的小桥，如甜甜的清亮亮的泉水，也灌溉了饥渴的乐坛，引出了潮流。在北头还‘凡人与狗不得进入’的时候，首家合资的中国大酒店率先打开大门，让富人、穷人可以同入厅堂，或观赏酒店的华丽，或享受五星服务；珠三角一带发家致富的农民伯伯，田埂边盖起了小洋楼，一色的小拍条磁砖，贴高兴了连公厕也贴，一时间，厕所砖也贴满了大江南北；听说酒吧之风尚也源于广州……然而革命的、流行的，以

及发源于此的林林总总，却舒服呆了，没脾气、没邀请的广州蹲不住了，纷纷北上寻觅文化与经济的落差之快感，随便捞点银子去了，留下的广州却是有姿势没实际的，徒有文化名城虚名的，没精神内容的大排档一条街。”^①我猜测这篇文章的作者不是地道的广州人，然而在这位作者眼中的广州，应当代表了是当今的外地人对广州的一种相当普遍的看法。

论及广府文化的特征，既要看到其在中华各地域文化中后来居上的充满生机活力的优势，也要看到其先天的不足。广府文化是开放的，但同时也有封闭的一面；是务实的，同时也有不理性直观短视的一面；是善变的，同时也有不能经过积淀而成大器的一面。这些不足也是岭南文化之不足。开放使广府文化吸收了许多营养，但以实利为动机的内在自我，却使人对开放之后的吸收有所选择和限制。在近代史上，广州人可以允许在一口通商中与洋人往来以获得城市商贸之利，而一旦认定洋人入城会损及既得利益，在实际上是商绅领导下的反洋人入城斗争的坚韧性与持久性，就远在各口岸开放城市之上。鸦片战争时期，洋人占领了广州，“巡抚柏贵出来作英、法的傀儡维持地方治安。民众不但不抵抗，且帮助英国人把藩台衙门的库银抬上英船。”^②当然，此时在城外成立了反抗侵略的团练，但是广州城内的这一段历史，却是本地人后来感到难堪和不愿述及的。平民性与商业性是最重要的驱动力，各行各业中，最为开放和吸收融化最快的，就数饮食业。时装行业，捷足先登的是内衣和牛仔布服装，在南海、增城有着销量占全国出口比例甚大的产地，却产生不了国际大师级的时装设计师。在广州有着引领国内服装市场的服装制作与批发的集散大市场，广州人自身却不在乎穿什么，尤其不会把工夫和金钱大把地花在穿着的趋时与名贵上。务实使广府之地的每一寸土地都有着热腾腾的商机，每一件事情，都有可能成为赤裸裸的商机，旺气十足，但往往缺少一种远视；没有在内涵上下足功夫。比如建筑一座楼，重视其建造速度，注重其高度效应，标榜其招标名家及标新立异的外观，却忽视了或者说判断不了这一“标志性建筑”到底有多大的标志性文化内涵。打造教育事业，在校舍设施上颇下工夫，有骄人的表现，而在提高师资水平与优势学科上的表现就缺少震撼力。有了这些问题，让广府人在许多内地人心

^① 孙晔：《虚拟的文明》，载《南方航空》2005年第7期。

^②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第24页，岳麓书社1999年版。

目中的文化品位总要低一些，在不得不承认广东取得经济成就的事实的同时，还纠缠于“广东有没有文化”这样的命题上。如何正视广府文化的这种本原的缺陷，自觉地扬长避短，是研究民系文化的发展方向所应当着重注意的。

作者单位：广州市方志办